

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

卢仁龙

陶弘景（456—536）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匠，在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在道教、医学、文学等方面建树尤大。书法艺术也是他所驰骋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近代以来，人们对陶弘景的学术缺乏全面的研究，而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几乎根本无人问津。今特钩弋史料，试作申论，一以窥陶弘景学术之一端，同时，也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一点有用的史料。

一

陶弘景是一位早熟的人物，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书法上。《云笈七籤》卷一〇七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称：“先生四五岁便好书，今犹有六岁时书，已方幅成就。”方幅是晋宋以来习用的一个词，这里是指整齐成就的意思。陶翊是弘景之侄，史载其曾随洪远学书，所记出于目察耳闻，当属可信。陶弘景的好友邵陵王萧纶在所撰《梁解真中散大夫贞白先生陶隐居碑铭》中也称：“六岁便解书，能属文。”^①他如此早慧，除了有天才成分的一面外，更主要的是得自勤奋。这一点可以从如下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唐贾蒿《华阳隐居内传序》：“五六岁时，酷爱学书，虽戏弄罗前，唯执笔砚。”《南史本传》：“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后者便是人所熟知的“以荻画灰”勤学故事的所本。夙慧与勤奋使他很早就在书法上脱颖而出。

陶弘景很早即与书法结缘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从考察其家庭中可以得到理解。他是南朝士族世家之后，远祖陶谦作为孙权的属将已显赫于三国时代，祖、父两人也非无名之辈。他们同当时所有的士族家庭一样，十分注重在医学、书法、宗教等方面的素养。祖父陶隆（？—461）便以“好读书，善写”（《本起录》）知名。父陶贞宝（？—481）因袭祖艺，“善藁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值四十，书体似羊欣、萧思话为法。”（同上）陶弘景本以至孝著称，秉执庭训，学书习字，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对陶贞宝“书体似羊欣、萧思话为法”的探讨中，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羊、萧是继二王而起的书法大家，颇有时誉。书体上则全出自二王。虞龢《论书表》：“（欣）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法书要录》卷二）王僧虔《论书》更称羊欣“亲授（于）子敬，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又称“萧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法书要录》卷一）是知羊、萧皆承王体无疑。而陶贞宝以羊、萧为法，也是有其原因的。陶氏乃丹阳世族，萧思话久为丹阳尹，两人间故多周旋，以书相尚，或为自然。因此，我们推论陶贞宝之书远师二王，近学羊、萧，或亦近实。至于王字一体是否至此而斩，就难以揣知。不过依例而言，陶弘景早年书学渊源所自，归美二王，自非大过。

陶弘景书体于王字之外，当有博取。贾蒿《华阳隐居内传》载：“年十二时，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以黄素写太清诸丹法，乃忻然有志。”所记虽明陶氏学道之始，但也透露出有关书法方面的消息。这位写太清诸丹法的郗愔，并非一般经生，而是一位在书法上“与逸少早年抗行”（黄长睿《法帖刊误》下第五《王会稽书》语）的大家。又从当时人所评“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虞龢《论书表》）“郗愔书章草，亚于右

军”（王僧虔《论书》）诸语来看，郗愔在书法史上，实有足多。更值得注意的是，陶弘景既习道，又善书，其事正与郗愔相类；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注重他与郗书的渊源关系。

有关记述陶弘景书法事迹的史料很少，但在陶弘景自己的文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他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之二中说道：

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无书可看，乃愿作主书史。晚爱隶法，又羡典掌之人。尝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唯充恣五欲，实可耻愧，每以得作才鬼，亦当胜于玩仙，至今犹然。

这段话是陶弘景晚年的自述，其重要性非同小可。因为，陶弘景的晚年不仅名声如日中天，被梁武帝尊为“山中宰相”，而且在医、道上建树甚伟。而从上文所自述内容来看，心境之中，依恋书事，及至乎愿以难得之尊位，去换一富于眼福之“主书史”“典掌之人”。我初读此文，以为有谄君之意，熟玩之后，确知其实款叙心曲；他对书法的执着与厚爱，表白无遗。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能在书法上臻于大成的原因了。

谈到陶弘景的书法，必须述及这样一件事。陶弘景尝有“不能作仲尼，教人作仲尼”^②之愿，广收弟子，以致茅山道风大畅，有“玄门洙泗”^③之称。他众多的弟子中，不少是雅爱书道之辈，其中在书法上受他影响最巨、成就最大的首推孙文韬。元张雨《玄品录》卷一载：

孙文韬，一名韬，字文藏，会稽剡县人，入茅山师隐居，参受真法，及见杨（羲）、许（谧、迈）三真手书上经，稍学模写，遂大巧妙；后学大王，殊有深入，当时称之为华阳南洞。《九锡文》、《许长史旧馆坛碑》，并韬之书也。

在有的记载中，就把《旧馆坛碑》误归为陶弘景（详后），尤见

师徒二人的关系。在下文的考述中，我们更能发现，孙文韬书法与陶弘景关系甚大。除孙文韬外，还有张绛、陈宣懋等在书史上也足称述。《颜氏家训·杂志》中又称：“江南闾里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託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也。”细细推究颜之推这段记述，从中可以发现时人对陶氏书法造诣的推重。并可知所传弟子中，不无擅书之士，非仅全为烧炉炼丹之辈。

二

这里，我们要专门考论陶弘景在书法史上的两大史实：（一）是陶弘景对道教上清派书法的弘扬；（二）是同梁武帝论书的几个问题。先谈前一事。

道教上清派是产生于晋代的一个以存思守神为主的重要道派。它的创始人是晋代魏华存魏夫人。魏夫人传真人杨羲，杨羲传许谧、迈，至陶弘景为七传。陶弘景既是这一道派的继承者，又是新的开拓者。是他总结并整理出了上清道派的经典著作——《真诰》。据《本起录》载：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484—486）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领道家符图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历经摹写，意有所未惬者。于是更相博访远近以正之。戊辰年（488）始往茅山，更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490）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原注：“此一诰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欢）居士已撰，多有漏谬，更詮次叙注之。”）

《真诰叙录》则称：“《真诰》者，真人口授之诰也，……当言真人之手书迹也。”从上所叙可知，《真诰》乃陶弘景纂集杨羲、许氏手书真迹而成。他纂集这些真迹固然是出于对宗教的热忱，

这里不必加以论略，但是与书法史实也有很大的关联。关于这点，必须先来认识杨、许等上清真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据《真诰叙录》：“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鄱法，笔力规矩，兼于二王。掾书乃学杨，而字体劲利，遍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殆非人工所逮。长史章草迺能，而正书古拙。隐居昔见张道恩善别法书，叹为神识。今睹三君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自思非智艺所及，特天假此监，令有以显悟尔。”陶弘景尽数年之力，集合杨羲、许谧、迈三真笔迹，一方面作为宗教经典，摹集为《真诰》一书传世，一方面主要出于书法上的考虑，将真迹保存在茅山昭真台中^④。上面的这段评述，就是他在遍搜广摹三真书迹之后的总结性认识。它无疑是认识道教书法的重要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今本《真诰》中可知，其中所录文字，特别是卷十七内容，仅是一般函札，与习见王羲之、献之帖文相同，没有多少布道之意。显然所集乃以存真为主。这些真迹后来成了茅山道派学习的好帖本，前文提到的孙文韬便是取法有成的一家。直到唐代玄宗时期，昭真台所封真迹大都见存，至宋元，似已散落。

我们不妨再看看道教之外对杨羲书法的品评。最早的当数熟习道教的窦息之言了，《述书赋》称：“杨真人之正行，兼淳熟而相成，方圆自我，结构遗名，如舟楫之不系，混宠辱以若惊。”又自注：“真人讳羲，弘农人，今见行书《带名》六行。”（《法书要录》卷六）窦氏既亲见古帖，又谙于道教^⑤，所品定非虚言。明人邹迪光《良常仙系记》则赞其“工书画，与王右军并名重海内。”（《续说郛》卷八）其所推不可谓不高。他的传帖，大都录在《真诰》之中。《登真隐诀》佚文另载有杨羲手书张镇南古本《老子道德经》。邹迪光说其与王右军并名重海内，也是有根据的。据赵孟頫言，世传《黄庭经》小字本，为杨羲手迹，非王

羲之所书^⑥。董其昌、《玉虹签真帖》均从其说。《黄庭经》本为上清派要典，《真诰》中所录杨羲扶箕之笔，多有此经原文相契合处，均足为据。要言之，杨羲深于书法，早有定评。

再谈许谧之书。许谧是王羲之的座上客，这是史有明文的。

《云笈七籤》卷一〇六有《许先生传》，从文风来看，疑为王羲之所撰。这当然根据王羲之习道服食的一面；但我们这里也应该看到王、许二人在书法上实有共同爱好。当然，以王羲之在书法上的造诣，所友之许谧，当非俗辈自可揆知。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曾提及许所书《缪袭告墓文》，旧被误以为王羲之书，至陶弘景始加识别。据此即可推知许、王所书之体相近。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引董其昌云：王羲之启文中“略不复自书，皆使一人，而此人书世不能贤”之“此一人”，或即许先生。意即许曾为王羲之代笔人。董其昌的推论对理解上文是很富启发性的。

由上可知，杨羲、许谧、许迈不仅是道教上清派的创立者，也是两晋时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外书所纪，虽不及《真诰》等道书所记详尽，但仍可窥见其大家风致。由于过去人们一贯秉承“书家不论仙”（郑杓《衍极》）的传统，所以在书法史上罕有称述。这样，陶弘景作为真迹的集合者和史实的叙述者，加上他本身在书艺上的高超素养与地位，上清派诸书家在齐梁以来，既得到了表彰，也得到了赓续、弘扬。因此，他所进行的道教史资料集合工作，不仅有功于道教，也是对书法史的贡献，而史料之出，全得之陶弘景的记述、整理与保存。此似应引起书法史研究的注意。

陶弘景同梁武帝论书，“连篇累牍”，为史所艳称。许多典籍中都录有那几段有名的文字。这里姑择要论之。

梁武帝和陶弘景之间是早结神明之交。梁代齐而兴，陶为之拆字定国号。（见《梁书》、《南史》本传）。武帝在位，尊陶为国

师，又封其为山中宰相，足见其交谊之深。梁武本文人皇帝，因得宋室之旧，所藏文物甚多，法书尤夥。宋姜夔《绉帖平》四：

梁武帝藏钟（繇）、张（芝）、二王书甚多，尝使虞（龢）、陶弘景辈订正。

姜夔所记虞龢事有误，《四库总目》已纠其谬，但言陶弘景则正与诸启相合。从今存的陶弘景五首启文来看，梁武帝对他不仅咸允其请，而且罄其所积，以便观摩。对此，陶弘景感叹不已：

“今赐书卷第遂至二百七十，……若非殊恩，岂可觖望。”（启之二）这无疑有利于陶在书法上的更进一步发展。

在诸启中，除反映了萧衍与陶弘景君臣的文字之交外，更主要的是显示了陶弘景精于鉴赏的一面。过去论书者咸称：“善书不善鉴，善鉴不善书。”而陶氏在数启之中，去伪存真，品鹭高下，诚如梁武帝所赞：“区别诸书，良有精审，所异所同，所未可知。”如果我们再参照《真诰》中对诸真的鉴别之文，足可推其善鉴之功。对此，宋人黄长睿已推美于前，并有企慕不已之叹：

“安得隐居、张道恩辈与之论书哉！”（见《东观余论》）参观众启，确非溢美之辞。启之四有云：

比世皆高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请学钟法。

很明显，他主张学钟繇、重王羲之，而贬王献之书。然而，他的这一论说是与当时书风大不相同的。自两晋以来，书坛上“随世所贵，规模子敬（献之）”（萧子云书论语）。这种推重，不是艺术上的取向，而多出于士风附会。陶弘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与深刻考察，提出了这一尊钟繇、王羲之书的论点，为唐代尊王开了先导。

但是，全面考察当时的论说，我们就会发现，对钟、王的推

重并非首发于陶弘景。先此，梁武帝已有此说。应该说，陶弘景所宣扬的钟、王之书，显然受到梁武帝的影响。梁武帝是真正最早推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论道：

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法书要录》卷二）

梁武帝此文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轩輊甚明。再比观陶弘景所论，殆同纶音。考察当时史实，我们有理由证明梁武帝所论在先。其一，寻绎陶说，似推演武帝文而立论。其二，从《梁书·萧子云传》中可知，武帝此论，当时广为推崇，或为书坛钦旨，亦未可知。贞白从而附和，实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把归美钟、王首功属之陶弘景。但是，陶弘景并非亦步亦趋。首先，陶弘景同当时士族人物一样，虽然博取众艺，但对正统之隶体仍然奉为书学圭臬。其二，他本人就以善隶书闻名，钟繇在时无不被尊为隶体之至擅者。其三，作为熟谙书史的陶弘景，当然清楚由钟而王，再由逸少而子敬的递进源流，不染时风，究明源绪，应是他取法的重要原则。因此，他有与武帝共同的取向，亦非偶然。

至此，我们看到，武帝、贞白所共同著论表彰的钟繇、逸少之书，不仅代表了历史的发展，也扭转了时风，并首开唐代推美王逸少一家的先例。因而，把对王羲之书法的弘扬完全归于唐人，实不能视为的论。

三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道：“书家好观阁帖，此正是病，……当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隐居、大令帖几种为宗，余俱不必学。”他对陶弘景的推重是相当高的。这里我们暂且不必盲

从其说，倒是要看看陶弘景到底有哪些名帖传世？清人杨大瓢（宾），《铁函斋题跋》卷六《旧馆坛记碑》下论道：“陶隐居书见诸记载者有《黄庭外景经》、《大洞真经隐诀》、《画版帖》、《入山帖》、《旧馆坛记碑》五种，而皆未之见。”杨氏最称名家，所考尚仅及此而已，并一无所见，是隐居之书，岂无从而学欤？杨氏之考，实不足据。今检索群书，略考其贴目及流传如下。其中《瘞鹤铭》及《旧馆坛碑》，清人已有专撰，不再详及，仅记其所说，略加补苴而已。

《杨琼瑶密辞》 首见于《宣和书谱》卷八著录，标明为行书体。黄长睿《东观余论》：“今观其为杨琼瑶作奏章藁，与前二书，（谓《画版帖》及《旧坛馆碑》，详后。）虽真行不同，要非异事也。”是黄氏亦亲见此帖。《旧坛馆碑》为真书，则此帖为行书可知，与《宣和书谱》所言正合。《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一录有《陶弘景奏章藁》一帖，盖即此帖之异名。碑帖目名，向无定规，此又其一例。杨琼瑶为何人，今不可考。此帖当为陶弘景早岁所书。《云笈七籤》一〇七《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起宜都王侍读，齐侍读任皆总知记室手笔事，选须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牋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考其时陶年方二十七^⑦，以后罕有宦迹，故推论奏章作于此时，或不为过。书亡，无可考。

《华阳洞天帖》、《茅山帖》、《茅山仙迹》 均见《宣和书谱》卷八著录，行书。茅山为陶弘景归隐之地，华阳洞天为其居茅山炼养之处胜迹遗字内，当出必然。书迹早已亡佚，它无可考。

《屈画帖》 《宣和书谱》著录，行书体。《东观余论·跋陶华阳书后》：“又世有《画版帖》四十三行，与碑字笔势同。”又卷上《论书八篇》之七：“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瘞鹤铭》，皆其遗迹也，今人罕能辨之。”所言《画版帖》

盖《书谱》中之《屈画帖》，亦异称也。宋曹勋论此帖曰：“清高闲澹，雅有秀韵，是知欧（阳询）、虞（世南）作略得六朝韵为深。帖语邀屈画工，故其说颇详云。”^⑧是宋人皆见真迹。周密《云烟过眼录》：“陶弘景书《板帖》，王介石（自注：虎臣）所藏。”是御府之藏，宋末已入雅士之私库矣。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郭在之家陶隐居《画版帖》凡四十三行，全似《瘞鹤铭》，卷首有李伯时写隐居真，今在梁溪倪元镇所。”《式古堂书画汇考》四亦载郭北山御史家藏中有陶弘景《屈画帖》，《困学斋杂录》所记同。后不知所在，今亡佚。

《带名帖》 《宣和书谱》著录，行书体。窦泉《述书赋》：“真人讳羲，弘农人，今见带名六行。”董其昌《戏鸿堂法书》：“顾唐时止有带名六行。”则《带名》一帖应为杨羲所书，而《宣和书谱》所录有误。或曰：此为陶氏摹本，陶氏曾遍搜杨氏手迹，并力加摹写。宋黄长睿赞曰：“但搨字要当如陶华阳摹杨、许书法乃佳耳。”（《东观余论》）。是固明其善摹杨书。惜亦早归尘蚀，杨书、陶书，皆无从考见。

以上就《宣和书谱》所录考之，御府之外，固多遗珍。《铁函斋题跋》所论《黄庭外景经》、《大洞真经隐诀》即是。杨氏未加详说，今亦补考如下：

《黄庭外景经》 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陶隐居小字《黄庭外景经》，谢起翁物。”又云：“张与可（自注：斯立，号繡江。）所藏有陶弘景小字《黄庭外景经》。”杨氏所录盖据于此。案之周说，是此帖数纪间即已易手他人，真乃云烟之物。又据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三上载：“震泽王氏世传陶隐居《黄庭外景经》，楷法俊逸，翩翩不群，原系张可与故物。可与、号繡江，前元名士也，生平宝秘萧子云进写古文启真迹及此。”是于文献间犹得寻觅鸿泥雪爪，实物亦早遗之。又案：《黄庭外景经》为道教上清派要典《黄庭经》三景之一，相传为

魏夫人所撰^⑨。陶弘景是该派文献的整理者和总结者，其代表作《真诰》、《登真隐诀》中或引其文，或袭其说（参见虞万里《黄庭经新考》）。《东观余论·跋黄庭内景经后》：“自杨、许仙去，大传于世，而积载既久，转写多误。……惟华阳《登真隐诀》所载乃杨、许旧本，可以据依。余参雠众本，而以《隐诀》是正，庶几不失真语云。”则知《登真隐诀》中录有《黄庭内景》。《外景》一般以为早于《内景》之作，《登真隐诀》当亦录其文，今《隐诀》已佚，仍存《诵黄庭经法》。据上，则此帖当为《隐诀》之遗佚。

《大洞真经隐诀》 《云烟过眼录》：“天台谢奕修养洁斋所藏陶隐居小楷《大洞真经隐诀》后，有林希父子题。”林，北宋人。谢即谢起翁，又藏《黄庭外景》一帖者，是并传之有绪。

《武古堂书画汇考》及《铁函斋题跋》盖据上为说。宋陈景元《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引《登真隐诀·第二经传条例》云：“《大洞真经》，今世中有两本，一则大卷，前有回风混合之道，而辞旨假附，多是浮伪；一本唯有三十九章。”陈景元云：“又闻有杨、许三十九章者，与世中小本不殊。”陈所云杨、许三十九章本，当为陶氏所集。陶又有摹本，盖世所传谢起翁物。若此帖为真物，则又可补道史之所未备。今所传即有三十九章本。本经无“隐诀”二字，此有其文者，或亦辑入《登真隐诀》。今《隐诀》多佚，又难考其实。

《华阳隐居真迹帖》 今存，载明文征明所刻《停云馆帖》卷一《晋唐小楷》内^⑩。清康熙中陈永春纂《秀餐轩帖》卷二亦翻刻之，署为“陶弘景诗帖”，同时人扬州李宗孔《李书楼正字帖》卷一则录为“陶弘景《寒谷夜将晨》五言诗二首”。此殆立异求售，非有他得也。案：此帖为宋以后新出，文献间载，名称或异。王象之《舆地记碑目》卷一所称玉晨观《陶隐居帖》，《宝刻丛编》十四之《陶隐居法帖》，盖均指此帖。今帖文载在

《茅山志》卷二十一，始题为《华阳隐居真迹帖》，并称：“初真迹藏建安徐閤中家，宋宣和癸卯十二月、道士芮南华摹刻传世。”《焦氏笔乘又续》袭之。宋曹士冕所称：“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阳馆帖》参校，然后众疑释。”盖亦指此。以其帖文中有“今犹在朱阳馆东”字也。《清河书画舫》卷三上，《书画闻见表》中、《米南宫秘玩书目》、《王氏法书苑》皆同。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一三四《陶弘景入山帖》所记即此帖，是杨大瓢所称亦有所本。此帖自文氏父子摹传，渐见重于后世，明陆昭珪已有临本，见《有美堂帖》卷十二。清末沈曾植《海日楼丛札》卷八尤见推重，实皆慕陶氏之名也。然今检读原帖，虽正行相间，字体秀逸，然非唐以上人所书，则可明知。至读帖文，尤知其谬。昔王世贞已发其疑，今尤明其伪。盖好事者踵事增华，归美于贞白，实非真迹。前人有言，唐以前所传书迹，类皆摹本，此则非止摹迹，实道士芮南华辈所书，然固为高手之笔，不可轻掷。存而不论可也。又，近人容庚编《丛帖目》，录《停云馆帖》此本为《元帝帖》，是以帖文首字为标，既弃旧称，擅构新目，非吾所取。

《神仙起居法》 明李日华《六砚斋二笔》卷三：“陶隐居军十二，于渠阁法书中见郗愔书。……大都东晋士大夫既留意笔札，又不屑为俗间书，是以右军《黄庭内外景》、陶贞白《神仙起居法》，琅然照世，不独杨许喜录上真秘踵也。”今案：《神仙起居法》乃五代杨凝式名帖，竹嫩为擅书之士，不知何故有此谬说，恐人误袭，特发正之。

隐居手书墓壁文 《茅山志》八：“宋元祐初，中贵人罗淳一学道山中，尝意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其圻磬壁环绕，相次成文，隐起壁上。其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捨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棲神’。书迹神妙，当是隐居手书。墓既开，

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元祐六年，长乐林希子中所传如此。”据此，则为宋人新得之真迹，后亦无传。

《瘞鹤铭》 清翁方纲《瘞鹤铭补考·铭书出于陶贞白辨》：“是铭撰书立石，皆托于仙侣，自昔著录之家，初无定说。其以为王右军书者，自唐人所著《润州图经》始，而宋黄山谷、苏子美及郡守赵潜元、郝经伯皆因之；以为顾况者，则沈存中及《焦氏笔乘》也。以为陶隐居者，《西清诗话》、《研北杂志》、周晖《金陵琐事》。据唐李石《续博物志》刘昌诗《芦浦笔记》、《苕溪渔隐丛话》、王观国《学林》、董道《广川书跋》、黄长睿《东观余论》以及马子俨、柳贯、陶九成、顾元庆、元郝敬、孙克宏、顾炎武、林侗之类，凡数十家。其阙疑而不敢定者，自欧阳修、宋胜非《秀水闲居录》、李之仪《姑溪题跋》以及近日张力臣、汪退谷、王若林诸家也。以理论之，则华阳真逸、上皇山樵、江阴真宰、丹阳外仙尉之类，皆无姓氏可考，自以阙疑为是。况华阳真逸乃撰人，非书人，似尤不必凿指为陶贞白矣。然世所传《华阳隐居真迹》一帖，实与《鹤铭》相类。”今案：自来考《瘞鹤铭》者甚夥，翁氏已概举其要，然亦未尽，不再缕述。诸家以陶贞白撰并书者，因其文辞书体并佳故也。

《许长史旧坛碑馆》 清翁大年有《旧馆坛碑考》详论其事。其文以为“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弟子华阳隐居丹杨陶弘景谨造”二十四字为陶弘景所书，正文为孙文韬书，碑初立于天监十七年，碑阴则刻于普通三年。唐刘明素曾予重勒。其说是也。今有天一阁拓本。原碑据顾华玉《重修玉晨观记》毁于嘉靖三年之火。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下所记正与翁氏考相合。孙星衍《寰宇访碑记》记天一阁拓本署为天监十五年立者，误也。

至于陶弘景撰文而被诸金石者甚多，虽与书法有关，但于本文则可不论，仅记其目于此：《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孙文韬书、梁普通三年立。（《輿地记碑目》、《宝刻类编》八、《茅

山志》二一)《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五:“梁陶弘景撰,陈升正书,调露二年正月重建。”《金石录》、《舆地记碑目》卷一、《续纂句容县志·金石》上同。《华阳颂》,唐天宝九年立(《舆地记碑目》)刘行矩(当作明素)刻石(《宝刻丛编》十四),正书。《茅山长沙馆碑》、《茅山曲林馆碑》、《华阳隐居授门弟子陆敬游十赉文》,均见《茅山志·金薤篇》(卷二一)。《太平山日门馆碑》,见《陶隐居集》卷下。足征其文为后世之所重。

综上所述,则自来陶氏真迹罕传,而后世以其书名而多有依托,考书史者不可不明其本。

四

关于陶弘景书法成就的评价问题,前代史书所载可谓“独多”。早在他三十六岁入山时,谢朓所作小传已称他“善古今法。”(《云笈七籤》)其后《本起录》(约撰于弘景中晚年)所评更加具体:“善隶书,不类常式,别作一家,骨体劲媚。”这些品评作于陶氏生前,推美之高,足可骇众。值得注意的是对其隶书一体有美评,(《梁书》、《南史》本传亦祖之。)这对理解他提倡学钟繇有很大的帮助。

后世的书论家十分重视他的成就与造诣。《太平御览》引《真诰》(?)称其“善隶书,号效王书,而别为一法。”唐人张怀瓘《书断》总称:“弘景书师钟、王,采其骨气,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其书劲利,欧、虞往往不如,隶行入能。”(《法书要录》卷七)是于隶书之外,又推行书,并考其所祖。参之上考,正切其说。至于美其“仙方翰彩,状于山谷”(庾肩吾《书品》);“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性”(袁昂《古今书评》)之类甚多,观其大致可也。

这里所要补充的是,从上文所考可知,陶弘景不仅是齐梁之

际继二王、开欧虞的一代大家（隶、行并佳），而且也是一位对书法史有着独特贡献，特别是在鉴赏、品评与弘扬道教上清派书迹方面颇有成绩的大师。

由于道教书法的不受重视，因而大大影响了对书法史料的发掘与认识。过去陈寅恪先生在其名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就曾提醒过人们，应该注重道教与书法乃至整个艺术的关系，并就天师道与书法的关联作了精辟的考证。（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本文对陶弘景及其书法史实的考辨，也可以说是就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同一问题的一点探索。确实，在具体的陶弘景及其上清派书法的认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道教人物对文化贡献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体察到道教文化所固具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及同中国文化本体的深刻联系的一面。我相信，虽然本文不足以言尽道教在书法乃至传统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随着这一领域的涉足，蕴藏在文化之中的真正内涵将会慢慢透发出来；并终将成为具有深刻意义的学术事业。

注：

- ①《茅山志》卷二十一《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师”字号，下同。
- ②唐贾蒿《华阳隐居内传》卷中语。
- ③“玄门洙泗”之称始于唐而盛于元。
- ④参《真诰·翼真检》第一、第二及《茅山志》卷八。
- ⑤《茅山志》卷二三有窦氏所书《景昭大法师碑》，可证。
- ⑥《茅山志》三十一载赵孟頫《题晋杨真人楷书黄素黄庭经》。参《贞居集补遗》下《题赵华禄小楷过秦论》等。
- ⑦参日·麦谷邦夫《陶弘景年谱考略》卷上、《东方宗教》27卷。
- ⑧《松隐集》文，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四引。
- ⑨参王明《黄庭经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廿本。
- ⑩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本。

作者工作单位：中华书局